

传播学论丛



# 环境传播

话语、修辞与政治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Rhetorics and Politics

刘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环境传播

话语、修辞与政治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Rhetorics and Politics

刘 涛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环境传播:话语、修辞与政治/刘涛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2  
(传播学论丛)

ISBN 978-7-301-19961-9

I. ①环… II. ①刘… III. ①生态环境—政治学—研究 ②生态环境—传播学—研究 IV. ①D0-05 ②G206-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9689 号

**书 名:** 环境传播:话语、修辞与政治

**著作责任者:** 刘 涛 著

**责任编辑:** 谢佳丽(xiejiali.com@hotmail.com) 周丽锦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961-9/G·328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5016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ss@pup.pku.edu.cn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0.25 印张 341 千字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 序 言

周 星

阅读国内第一本研究环境传播的著作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著者刘涛执著询问的身影,这是一位对社会问题焦虑而不断想身体力行予以纠偏的年轻人。每逢遇到小民苦痛的时候他都会情绪激昂地为之议论,乃至要奔赴某处亲眼目睹而抨击批评。社会正义感的来由既是他出生于西北的乡村,看到不少侵扰乡民生活的不良现象而耿耿于怀,也是一个青年学者在思考社会发展时,在理性的认知下非要辩驳清楚的使命感使然。的确,对于社会生活和环境考察的情不能已,似乎已经是与生俱来的情结,对待生活抑或研究问题,他的执著和投入,导致每每情绪激动地投入阐释对象,充满热情的快捷语言连珠炮般射出而不休止。背景是在读书期间,他曾经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做过不短时间的记者,亲眼目睹过社会底层的不公和纠结现象,当时他亲手做过的节目多有获奖并得到不小的社会反响。日积月累的职业习惯和关注人生艰难的本性,汇集成研究的聚焦点。

在随我读博期间,刘涛有过一年的国外联合培养的经历。在美国,他接触了许多学术新领域,让他的视野更为开阔,而对于环境传播的注重则是在此期间强化而专注了。这自然和留学域外相关。但对于环境传播的涉猎,却一下子抓住了他,实在是这一学科的前沿性和他内在的思考与这一学科所触碰的理据的契合。看他的成果,我们会认同其不断阐释的道理:“环境”从来都是一个被反复征用的修辞资源,附着于“环境”之上的是一系列深层次的文化含义和政治含义: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话语视角赋予环境议题以社会意义,公共参与和社会动员话语视角赋予环境议题以政治意义,绿色产业与生态投资话语视角赋予环境议题以经济意义,国家形象与社会资本话语视角赋予环境议题以外交意义,媒介表征与文化再现话语视角赋予环境议题以文化意义,“人、自然与技术”三者之间的话语思辨视角赋予环境议题以伦理意义或哲学意义……

的确,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环境传播”在国外的发展历史也并不长。在中国,关乎环境传播的认识更是略微亮相。但其实,这一相对陌生的论题,却在现实中不断敲击着人们的神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世纪以降的环境风险越来越引起关注。极大冲击传播的重要对象之一是厦门PX事件,那是一个引发社会群体性事件的社会现象,巨大的产业利益让地方政府坚守建设的目标,而已经觉醒的当地人不惜采取一切方式抗拒项目的实施,社会大众在媒介的持续报道中逐渐认识到环境污染的危险,而政府也由此意识到民怨的集聚与社会治安的重要性。于是,原本政府筹划建设的项目就注定无坚不摧,可是这一“习惯”被公众舆论、社会要求改变了。环境传播的基本意义在这里得到实践的证明,事实上也开始了自身价值的中国式认知。同样是在福建,一个叫紫金矿业的污染事件让大众义愤填膺,盛气凌人的黄金企业一直在污染环境,却凭借着巨大的税收奉献资本而肆无忌惮,这一次泄漏事件的轰动实在超越了地方足以保护的可能,巨大的环境灾难惊动了中央政府,传媒的追踪报道,让一个有恃无恐的大企业的唯利是图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即便如此,依然百般遮掩的企业传统在挑战大众心理底线的同时,也暴露了传播在企业心目中可有可无的地位。在媒体坚韧而倔强的披露下,这一事件的谜底最终揭开,企业和责任人受到了惩戒,环保使命的正面效能得到体现。近年来关于海南毒豇豆事件、小南海水电站事件、大亚湾核电站泄漏事件、南京拯救梧桐树事件、舟曲泥石流灾难事件、云南铬渣污染事件、广州番禺垃圾焚烧事件、陕西凤翔血铅超标事件、张正祥保护滇池事件、大连PX项目泄露事件、环境记者章轲起诉水电专家事件等等越来越展开在公众视野中的关乎环境和社会矛盾的传媒报道,为环境传播积累了不能不重视的经典案例。

作为研究者,刘涛关注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传播学科,而是作为人文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环境生存和自然的关系。对于环境传播的意义,更为看重其具有审视现实和反思现代性的话语框架和批判逻辑。在他看来,环境传播具有特殊的公共议题价值,可以审视环境背后的制度、参与、权利、公平与正义问题。所以,关于环境的讨论不仅仅局限于生态话语内部,如他所期待的,环境还是一种修辞、一个过程、一个跳板,它的落点往往指向某些社会深层次的话语内容。这就不能不涉及刘涛曾经作为中央电视台相关深度新闻记者编辑的经历。在那时,他参与的一些有影响的节目,都对人在社会环境中所遭遇的不公、自然和人为灾难所造就的个体或者群体影响做了深入的剖析。但限于现象还不是他的心灵所欲求的结果。不仅是作为从西部乡野走出来的孩子,看到过贫穷和不公所带来的问题而耿耿于怀,还因为一种责任,试图揭示社会发展中更为深入的问题的欲望,使之对于如何更为深入地探求人和社会、环境的关系更有尝试的激情。

而新闻从业者的传播理性,在思考问题时更希望有一种学说来支撑——于是新兴的环境传播便进入他的研究视野。

在2011年动荡不已的世界中,诸多环境问题都连带而生,尤其是日本核污染事件所波及的世界生态、环境生存和人类安危问题一直持续不绝。我们看到不同的利益关系在如此重大的灾难面前呈现的错综复杂的传播关系。作为环境传播研究者,看到的不仅是现实灾难,还应思考探究其背后的复杂问题,如刘涛所言,与其说环境传播所探讨的是与自然生态密切相关的传播学问题,莫若说是环境实践中不同参与主体(公民与社区组织、环保组织、科技专家、企业与商业公关组织、反环保主义组织、媒介与环境新闻、官员与政府部门)之间的话语生产与争夺问题,而这正是《环境传播:话语、修辞与政治》一书的基本立论取向。他用不断的示例揭示出无论是环保组织还是大众感知,环境保护都刻不容缓,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通过诸多方式制造公共事件,尤其是借助各种极端的身体叙事和图像政治途径向庞大而牢固的商业伦理发起挑战,以期构建生态中心主义环境伦理得以被识别、被激活、被生产的绿色公共领域;但另一方面,企业集团和反环保主义组织等利益群体则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他们借助各种公共关系途径和媒介表征体系来生产、制造并争夺一个时代的公共伦理,并使其成为唯一合法的伦理选择。所有这些声音之间的角逐和争夺,本质上围绕合法性而展开,尤其是关于环境意义的争夺,关于环境背后的价值伦理与社会秩序的争夺,因此呈现出一幅真正意义上的关于环境传播的图景。显而易见,这时的环境传播并非环境保护传播的代名词,而是蕴含着更为复杂的意义。我们可以说,《环境传播:话语、修辞与政治》一书并非单纯地强调媒介与组织如何参与环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而是更多地将“环境”视为公共议题建构以及公共话语生产与再生产的“场”,致力于研究这一特定场域中的话语问题、修辞问题与政治问题。

上述描述未必是刘涛所要展示的全部认知,而关于环境传播的意义也并非我的学术专长,但研读刘涛的著作,的确感受到环境传播已经成为一个急需深入探究的传播学分支领域。他心底里期望的显然是环境传播能早日上升到“学”的高度。由此,环境传播研究什么?有哪些可供切入的研究视角?环境如何与社会发生深层次的对话关系?环境实践中的不同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机制和话语机制又如何理解?这是环境传播目前急需理清的研究命题。刘涛显然是在思考这些问题中试图构建一个探索性的领域,就国内而言,也是较早开始开拓的学者。《环境传播:话语、修辞与政治》一书对相关环境传播的这些问题展开了极具探索性的前期思考,并形成了一定的理论成果,尤其是环境传播中关于公共议题构造的符号修辞学研究、关于“反话语空间”的生产机制研究、关于新社会运

动的动员机制研究、关于社会资本与生态公民身份的研究、关于图像政治与视觉修辞机制的研究等等,都是具有探索意义的。

翻阅刘涛的洋洋大作,掩卷而生感叹,作为我指导毕业的博士,在几年的交往过程中,已经让导师看到一个年轻学子的成长轨迹,而持续不断的深入,也造就了学生新的研究视野,这是一个导师倍感幸福的所在。必须说到刘涛作为新一代研究者较之老师辈的长处:具有良好的理论功底,学术视野更为开阔,他对福柯、霍尔、巴特、韦伯、布尔迪厄、雷蒙·威廉斯、朱迪斯·巴特勒等西方文化学者的思想情有独钟,心得所获在阅读时也每每给我不少启发,这也是作为导师其实受益于和他一样出色的学生的所在,授受之间获得的不仅是师生情谊,还有知识增进、思维精进和学养促发。显然这是许多学生在和我相处中能令导师内心欣慰的秘密。至于刘涛,从这本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在学术上闪烁的智慧和沉淀。我衷心期望他能由此延展下去,有底蕴更为深厚的学术研究成果面世。

# 目 录

<b>绪论 环境传播概述</b>	<b>/1</b>
第一节 环境与风险社会	/2
第二节 什么是环境传播	/5
第三节 环境传播的九大研究领域	/10
一、环境传播的话语与权力	/11
二、环境传播的修辞与叙述	/12
三、大众媒介与环境新闻	/14
四、环境政治与社会公平	/15
五、环境公关与社会动员	/17
六、环境危机传播与管理	/19
七、流行文化与环境表征	/21
八、环境议题与政治外交	/22
九、环境哲学与生态批评	/24
<b>上编 环境传播的话语与权力</b>	<b>/29</b>
<b>第一章 哲学、政治与环境话语范畴</b>	<b>/33</b>
第一节 生存理性与工业理性：一种哲学建构视角	/33
一、“进步”的意义表征与流变	/34
二、“自然”的意义表征与流变	/36
第二节 改良主义与激进主义：一种秩序思辨视角	/38
一、主导性环境话语与对抗性环境话语	/39
二、环境话语与西方保守主义政治传统	/41
第三节 哲学建构与秩序思辨：环境话语的分类框架	/45
一、环境传播的话语分类	/45
二、环境传播的话语结构	/47



<b>第二章 意义、秩序与九种环境话语</b>	<b>/50</b>
第一节 生存极限主义环境话语	/50
一、生存第一主义环境话语	/50
二、普罗米修斯主义环境话语	/56
第二节 生态理性主义环境话语	/57
一、行政理性主义环境话语	/58
二、民主实用主义环境话语	/60
三、经济理性主义环境话语	/63
第三节 生态现代主义环境话语	/65
一、可持续性环境话语	/66
二、现代性环境话语	/69
第四节 绿色激进主义环境话语	/73
一、绿色意识环境话语	/74
二、绿色政治环境话语	/80
<b>第三章 环境、话语与权力生产网络</b>	<b>/87</b>
第一节 资源力学与权力生产	/88
一、基于资源力学的三种权力观	/89
二、作为资源力学的环境话语运作	/91
第二节 政治力学与权力生产	/92
一、基于政治力学的三种权力观	/93
二、作为政治力学的环境话语运作	/94
第三节 微观力学与权力生产	/95
一、微观权力话语中的知识与规训	/96
二、作为微观力学的环境话语运作	/98
第四节 可持续环境话语与全球生态政治	/100
一、可持续性发展：一种全球公共话语	/100
二、生态共同体：一种后殖民话语视角	/101
第五节 自然极限、生物权力与性政治	/102
一、环境话语：从生物权力到身体规训	/102
二、计划生育：被政治接管的身体与性	/104
第六节 生态激进主义行为的媒介再现研究(1987—2008)	/106

- 一、意指概念:容纳政治欲望的再现符号 /106
- 二、框架分析:媒介话语中的意义与再现 /109
- 三、发明概念:被构造的“生态恐怖主义” /112
- 四、制造恐惧:危机建构的三维变量模型 /117

## 下编 环境传播的修辞与政治 /123

### 第四章 意义争夺与环境修辞运动 /126

#### 第一节 从象征交换到公共话语:修辞与新社会运动 /126

- 一、作为象征交换的语言修辞 /127
- 二、意识深处的环境主义运动 /128
- 三、新社会运动的修辞学理论体系 /130

#### 第二节 十大环境主义运动:基于象征权力的解读视角 /134

- 一、十大环境主义运动的修辞学解读 /135
- 二、作为象征性实践的环境修辞运动 /138
- 三、象征权力与环境修辞的“价格” /139
- 四、符号修辞的政治经济学解读视角 /142

#### 第三节 从神权哲学到视觉政治:美国环境传播的 修辞演变(1600—2000) /145

- 一、神权哲学与生态扩张运动 /147
- 二、身份建构与自然保护运动 /148
- 三、功利主义与生态保育运动 /150
- 四、生态民主与草根环境运动 /152
- 五、种族歧视与环境正义运动 /154
- 六、全球公民身份与全球环境运动 /156

### 第五章 环境传播与“反话语空间”的生产 /161

#### 第一节 拒抗、陈述与生产:解读环境传播中的“反话语空间” /161

- 一、“反话语空间”的话语表征 /162
- 二、“反话语空间”的空间书写 /164
- 三、“反话语空间”的意义生产 /166

#### 第二节 “反话语空间”的政治经济学生成机制 /168

- 一、“替代性公共领域”与公共话语 /169
- 二、“对抗性话语”的两种生产方式 /170
- 三、“绿色公共领域”与新环境范式 /172
- 第三节 “反话语空间”的社会心理学生成机制 /173
  - 一、认知层次理论与两种话语输入途径 /174
  - 二、作为心理图式表征的认知层次结构 /176
  - 三、价值量表、价值形态与元价值因子 /178
  - 四、终极性价值观与十种环境主义运动 /181
- 第四节 “反话语空间”的符号修辞学生成机制 /183
  - 一、“反话语空间”与修辞运动 /183
  - 二、“浮动的能指”与接合理论 /185
  - 三、“话语性场域”与意义争夺 /188
  - 四、“话语局限性”与拒抗机制 /191
  - 五、等价性拒抗链条的三种驱动机制 /192
  - 六、基于实践智慧的替代性接合理论 /195
- 第六章 环境传播的视觉修辞研究 /200
  - 第一节 视觉转向：图像霸权时代的“文化逻辑” /201
    - 一、以图像为中介的社会关系 /202
    - 二、仿像、编码与后现代状况 /203
    - 三、图像生产线上的文化转向 /204
  - 第二节 文化意象的语境化构造：视觉修辞的文化心理学运作机制 /206
    - 一、什么是视觉修辞 /207
    - 二、图像意义建构的两种认知机制 /208
    - 三、原型激活与文化意象的再生产 /210
    - 四、文化意象的心理学生成与构造 /214
  - 第三节 图像意义的符号学争夺：视觉修辞的语义结构与文化阐释 /217
    - 一、图像阐释的三个层次 /218
    - 二、意指、神话与符号的神话化 /219
    - 三、基于文化历史的图像阐释学 /224
    - 四、基于文化政治的图像阐释学 /226
  - 第四节 意指概念的图像化表征：视觉修辞的另一种意义生产机制 /231

一、构造新社会运动的意指概念	/232
二、行走于修辞与意识形态之间	/233
三、意指概念的可视化意义表征	/235
第五节 性别化再现的自然:广告修辞中的性别与自然	/239
一、洗绿运动与生态叙事	/239
二、自然身体与性别再现	/241
三、作为女性气质再现的生态叙事	/244
四、作为男性气质再现的生态叙事	/246
第六节 图像政治:环境议题再现的公共修辞视角	/249
一、社会争议建构的图像表征途径	/253
二、图像事件与绿色公共领域构建	/255
三、指向全球生态秩序的公共修辞	/258
四、图像政治的三种公共修辞策略	/260
第七节 身体政治:环境激进主义运动的身体反抗	/266
一、符号修辞与被征用的身体	/267
二、身体政治的三种反抗形式	/271
三、生命伦理与残酷身体叙事	/274
<b>结语 环境传播之于中国公民社会进程的启发</b>	<b>/279</b>
一、环境民主与社会公平	/280
二、社会资本与绿色公共领域	/281
三、国家形象与全球生态公民身份	/282
四、通往绿色公共领域的公共外交	/283
<b>参考文献</b>	<b>/285</b>
<b>后记</b>	<b>/310</b>

## 绪论 环境传播概述

经由工业主义和技术理性的系统改造,当今社会进入了贝克(Ulrich Beck)所说的风险社会,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的风险文化已经渗透到所有不确定的社会领域。而作为阐释风险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公共议题——自然环境问题,无疑成为我们接近并认识风险社会的有效切入点。这是因为,当我们把“自然环境”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构成元素来分析时,便赋予了“自然环境”一系列深层次的意义。具体而言,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赋予了环境问题以社会意义,生态民主和公共参与赋予了环境问题以政治意义,绿色产业与生态投资赋予了环境问题以经济意义,全球贸易与生态殖民赋予了环境问题以外交意义,“人、自然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赋予了环境问题以伦理意义和哲学意义……由此看来,环境问题已经不属于环境范畴本身,而是作为一个生产性的元素参与社会关系网络的搭建,并且成为我们认识其他社会场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语资源和修辞资源。尤其是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问题,并且深刻影响到社会其他领域的架构与秩序。因此,从传播学的视角和方法来研究环境问题,无疑赋予了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里所谓的环境,专指“自然环境”,而非一般抽象意义上的“环境”。

与此同时,政治传播、健康传播、科技传播、公共传播、家庭传播这些“舶来品”越来越受到本土学界的关注,中国传播学科在门类搭建层面逐渐与西方对接。尽管在研究方法和理论架构方面依然无法摆脱西方的“阴影”,但是至少预示着一个崭新的起步和对话。然而,一个不得不说的遗憾是,环境传播这一概念却始终未能引起国内学者“应有的”重视。在西方,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北方亚利桑那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等学术机构均设立了有关环境传播的学科专业或研究中心(Pleasant et al., 2002, p. 197);

2001年开始,致力于专门研究环境传播的诸多国际性学术期刊相继问世,如《环境传播:文化与自然学报》(*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 Journal of Nature and Culture*)、《环境传播年刊》(*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Yearbook*)、《环境政治学》(*Environmental Politics*)、《应用环境教育与传播》(*Applie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等等;同时,一系列致力于环境传播研究的学术著作也陆续出版,比如李·帕克(Lea J. Parker)的《环境传播:信息、媒介与方法》、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的《环境传播与公共领域》、斯蒂文·德普等人(De-poe et al.)的《环境议题决策中的传播与公共参与》、茱莉亚·科贝特(Julia B. Corbett)的《环境传播:我们如何读解环境信息》、阿诺·沙尔(Arno Scharl)的《在线环境传播》等等;此外,国际上四大最有影响力的传播学会“国际传播学会”(ICA)、“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AEJMC)、“国际传播研究学会”(IAMCR)和“全美传播学会”(NCA)都设立了有关环境传播的主题单元或工作坊。<sup>①</sup>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罗伯特·考克斯将环境传播研究上升到学科建设高度,并且在《自然的“危机学科”》一文中明确指出,环境传播已经成为传播学科门类下一个名副其实的分支领域,而且这一领域所关注的核心命题总是和危机(Danger)与风险(Risk)紧密地联系在一起(Cox, 2007; Schwarze, 2007)。因此,我们有必要从风险社会的话语视角切入进去,以此来认识环境传播。

### 第一节 环境与风险社会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风险社会》一书中指出,在工业主义微妙而强大的改造浪潮中,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危机四伏的风险社会,而且风险的诞生往往是“与文明进程和不断发展的现代化密切相连的”(乌尔里希·贝克、威廉姆斯, 2005, p. 3)。在贝克看来,风险这一概念是现代性的产物,因为在前现代时期,人的旨意是无法决定或改变自然与传统的固有品性的,自然灾害或众神愤怒被认为是一个合理而常态的存在,因此也就谈不上风险。而进入工业社会,自然和传统对于人的控制力已经被科学的、技术的、工业的、制度的力量吞噬殆尽,人得以按照自己的决定和行动来支配自然并改变传

---

<sup>①</sup> IAMCR 和 NCA 设立了“环境传播”主题分场,ICA 和 AEJMC 虽然没有设立关于环境传播的专门论坛分场,但每年都举办环境传播工作坊,并在“科技传播”与“健康传播”主题分场中特别强调接受有关环境传播的论文。

统,风险也就跟人的决定和行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风险概念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类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展示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乌尔里希·贝克、威廉姆斯,2001,p.119)。

安东尼·吉登斯(2005, pp.47—48)对风险概念做出了类似的解读,“风险指的是在与将来可能性关系中被评价的危险程度,它只是在将来的社会中被广泛使用——这个社会正好把将来看作是被征服或被殖民的范围”。吉登斯进一步将风险区分为两种类型:外部风险(External Risk)和人造风险(Manufactured Risk),外部风险主要强调“由传统或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而人造风险则强调“由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晌所产生的风险”(同上书,p.50)。

由此看来,风险构成了风险社会的基本范畴,而人造风险暗示着一个与过去时代的主要特征进行决裂的社会。这一观点在贝克那儿得到了更为具体的阐释,即风险存在于社会转型所引发的断裂和剧痛中:从古典工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从现代性社会转向反思现代性社会。也正是在社会转型中,风险得以伴随着制度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不断被发现、被认识。因此,风险总是和制度联系在一起,这一观点得到了包括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在内的众多社会学家的普遍认同。玛丽·道格拉斯和威尔德威斯则从文化的角度探讨风险社会的文化特征,伴随着社会转型而发生的风险被划分为三种类型:社会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分别与其对应的则是斯科特·拉什在《风险与文化》一书中提到的三种具体的风险文化: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市场个人主义文化和社会群落之边缘文化(斯科特·拉什,2002,p.55)。因此,社会结构与制度的变迁往往是三种风险文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权力冲突的政治风险和基于利益冲突的经济风险构成了社会结构变迁的生产基础,而由科技进步所掀起的自然风险则进一步加剧了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混乱不堪。比如就生态危机而言,等级制度主义文化和市场个人主义文化的蔓延创造了自然风险得以扎根的政治土壤和社会土壤,而生态危机的蔓延,则反过来削弱了边缘群体的政治参与权利和社会主体利益,整个社会被包裹在三种风险由于无序扩张和恶性渗透所引发的风险生态中。

尤其是在今天,风险问题所带来的社会冲突使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风险问题由此成为当今社会争论的主题,诸如“非典”、海啸、地震、疯牛病、禽流感、核泄漏、气候变暖、生态污染等自然风险则引发了深层的社会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社会文化领域的观念、价值与共识。由此可见,“风险社会既包括制度层次的意义,也有文化层次的内涵,二者都是构成风险社会的基本要素”(周战越,2005,p.12)。一方面,当今社会是风险文化最容易浮现和蔓延的时代,以不确定性为主要特征的风险文化将渗透到所有不确定的社会领域;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透过风险文化来审视并剖析深层的制度问题,风险文化必将成为我们反思制度、反思科技、反思现代性的一种最有说服力的话语资源和文化形态。因此,要在制度与文化两个层次上有效地认识风险,并尽可能地实现风险规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认识风险?风险存在于何处?如何才能识别附着于风险之上的不确定性?这便涉及描述风险文化的两个重要概念:作为风险认知载体的社会矛盾以及作为风险传播建构的公共话语。

因此,风险存在于社会矛盾之中,我们接近、识别和应对风险的有效途径是诉求于公共议题的建构以及公共话语的生产,而自然环境正是我们识别风险社会、描述风险文化的一个直接而醒目的切入点。换言之,风险的核心基质是不确定性,它并非一个可触可感的公共议题范畴,我们唯有从其他社会议题所呈现的不确定性中来认识风险以及风险文化,而围绕公共健康和公共安全所建构的环境问题则是阐释风险文化(尤其是自然风险)最有代表性的公共议题,尤其是当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时,作为话语建构的“环境”概念已经无可厚非地成为风险社会认知的最有代表性的话语资源,即环境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接近自然风险的认知渠道,一定意义上也是引燃社会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话语载体。就转型时期的中国而言,环境风险在这里似乎有着更为特殊而深刻的意义,由环境问题所制造的社会风险足以让每一个中国人倍感纠结——厦门PX事件、小南海水电站事件、海南毒豇豆事件、大亚湾核电站泄漏事件、舟曲泥石流灾难事件、广州番禺垃圾焚烧事件、紫金矿业污染事件、陕西凤翔血铅事件、张正祥保护滇池事件、环境记者章轲起诉水电专家事件等这些标志性的环境事件所引发的不仅仅是一个个单纯的生态学命题,而是直接指向深层次的制度安全、社会正义与文化观念问题。

因此,当我们把“环境”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构成元素来看待时,便引申出一系列深层次的文化含义和政治含义。具体而言,当我们从公共健康和公共安



全的角度来审视环境时,环境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当我们从公共参与和环境民主的角度来审视环境时,环境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当我们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博弈角度来审视环境时,环境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当我们从全球贸易与国家形象的角度来审视环境时,环境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外交问题;当我们从话语与权力的角度来审视大众流行文化中的环境表征时,环境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当我们从“人、自然与技术”三者的关系来审视人自身的价值定位时,环境问题本质上也是一个伦理问题……

从不同的角度审视环境,便生成了不同的“环境意义”。也就是说,基于环境命题的传播,可以引申出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命题,同时也可以建构起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媒介是如何选择、编码、架构并叙述环境信息的?哪些社会声音参与了环境议题的建构,它们又是如何建构自身话语的完整性和排他性?支配环境“意义建构”的权力网络是如何干预整个传播过程的?支撑环境传播的社会动力机制是如何运转的?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应,不仅体现为环境传播研究的价值所在,同时也体现为环境传播之于风险社会研究的价值所在。

## 第二节 什么是环境传播

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在1989年最早提出环境传播这一概念,他在其经典著作《环境传播》中对环境传播的界定是:“旨在改变社会传播结构与话语系统的任何一种有关环境议题表达的传播实践与方式”(Luhmann, 1989, p. 28)。在卢曼看来,社会是一个由符号与传播架构起来的集合体,而环境议题与环境意识的放大与改变唯有诉诸于传播才能产生特定的社会效果,与此同时,卢曼从认知论与现象学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将环境危机(Environmental Danger)定位为“社会”与“自然”产生深度关联或裂变的中间纽带,因此,环境传播核心要探讨的是联结环境安全与社会变革的符号解释行为和话语建构行为。1996年,全美传播学会(NCA)的环境传播委员会以一种直接而简单的语言揭示出环境传播的基本范畴:“研究环境问题和传播实践之间内在关系的社会学领域”(Pleasant et al., 2002, p. 197)。不得不承认,NCA对于环境传播的界定依然停留在“环境传播”的字面读解上,并未在传播机制和传播关系上揭示出环境传播的深度和空间。一个接踵而来的问题是,难道环境传播和政治传播的区别仅仅体现在“环境”和“政治”二字上吗?迈尔森和里丁(Myserson &